

觀念轉變與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

● 劉青峰、金觀濤

一 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 三階段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結束了半個多世紀對引進西學的抗拒、猶疑和混亂，進入全面、迅速的確立時期。1913年發生了兩件在學術史上有指標意義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這年年初教育部頒布《大學令》和《大學規程》，規定大學設置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七門學科。其中文科取消了經學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和地理學。它表明，中國的學術和教育已納入了世界通行的現代體系^①。第二件大事是總統高級顧問馬相伯上書袁世凱，建言以「法國阿伽代米」（即法蘭西學術院 [Académie française]）為榜樣，設置國家級別的最高學術機構「函夏考文苑」^②，是為創建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提案。

如果把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視為中國學術現代轉型完成的標誌，那麼由此往前回溯，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甲午中日戰爭這半個多世紀，是西學被納入儒學經世致用的時期；人文學科中與實用密切相關的地理學和語言學，最早向現代學術轉型。

第二階段是1895年到民國建立的近二十年。這一時期，由中學的一元獨霸、獨尊，開始轉變為中學、西學分立的二元格局。其間，科舉制廢除，新知識潮水般湧進，新型教育及學術體制迅速普及。正是在第二階段，歷史學和文學開始向現代學科轉化。

第三階段是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即從民國初年到1920年代中後期。在這一被稱為全盤反傳統、或者說是對學習和引進的西方現代觀念進行重構的時期，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結束了半個多世紀對引進西學的抗拒、猶疑和混亂，進入全面、迅速的確立時期。其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為關鍵的是百年前全面學習、引進現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第二階段。

* 本文是應台灣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為國科會籌劃的「百年人文傳承大展」組稿而寫的；相關文章編成文集，將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現蒙計劃主持人同意另外發表，特此致謝。

核心——儒學的義理，終於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

在這三階段中，最為關鍵的是百年前全面學習、引進現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第二階段。經過三階段半個多世紀，中國現代人文學科才逐步確立起來。

姑且先撇開價值評判，眾所周知，現代性起源於西方，中華文明的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是接受、學習、引進西學的結果。人文學科作為現代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實現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前提是其研究對象和方法被納入現代學術規範。以1905年廢科舉、「科學」取代「格致」為標誌，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逐步地、全面完成了傳統向現代的範式轉變，而現代學術（包括教育）體制的最後確立則在1920年代末期。

但是，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不同，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不可能是單純引進、移植西學，而須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安頓、重構自身悠久豐厚的傳統。這就必定會涉及到中西文化互動中諸多複雜而又糾纏的問題。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現代人文學科建立和中國現代思想形成及演變的全過程相關，與中華帝國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相始終。也正因為如此，民國的建立學術史才可以成為一個重要關節點。

近十多年來，一批研究中國現代人文學科轉型的著述相繼問世，大大推動了學術史研究^③。但對於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以及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尚沒有給出較為宏觀的說明。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打算從一個比較特殊的角度，即從學科用詞及其內涵的變化來分析這些詞彙背後

主導觀念的轉變，以揭示中國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④。

從1997年起，我們開始以關鍵詞為中心研究中國現代政治術語的形成，在持續十多年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漢語政治詞彙的演變也有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使用中國既有詞彙（觀念）來理解西方對應詞彙的意義，選擇性吸收西方觀念；第二個階段則是大量引進新詞彙，出現新名詞大爆炸，同一現代事物、學科往往出現不同的指稱；第三個階段則是眾多新名詞及其意義定型為現代漢語的固定用詞^⑤。十分有趣的是，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正好也與這三階段相吻合。

二 為甚麼地理學、語言學率先破土而出？

「地理」和「語言」是中文舊詞，但「語言學」和「地理學」卻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出現並開始使用的專有名詞^⑥。在「地理」和「語言」兩詞後面加上個「學」字，可視為這兩門學問與傳統母體相分離，向現代知識系統轉型。

地理這門學問在中國萌發很早。《禹貢》、《漢書·地理志》已形成了「九州」的系統地理知識，但在近兩千年的積累、演進中，它受到華夏文明中心的天下觀支配並服務於王朝治理和興替的經驗總結，一直從屬於史學，是儒學的一部分。顧炎武的《日知錄》第三十一卷名為〈論地理〉，其「地理」一詞所指涉的知識內容，正如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名中「天下」、「郡國」、「利病」三個關鍵詞所揭示的，主要是關心那些治理郡國的地理知識。唐曉峰把傳統地理學問稱

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性，現代人文學科建立和中國現代思想形成及演變的全過程相關，與中華帝國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相始終。也正因為如此，民國的建立學術史才可以成為一個重要關節點。

為「王朝地理」是很有見地的。他指出：中國傳統地理是受儒學「聖王之治不在荒遠」觀念所主導，士大夫不屑於理睬蠻夷世界，只關心治理屬於郡縣制的內臣地區⑦。

早在明末，西方地理學已傳入中國，但在士人心目中，由利瑪竇 (Matteo Ricci) 引進的《萬國坤輿圖》，或是對沒有把中華帝國置於地圖的中心位置而抵觸，或只是對海外博物新奇之事感興趣，因此並沒有受到士人認真對待或重視。直到1839年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官紳的政治目光再也不可能局限於天下的內臣地區了，才不得不睜眼看世界。欽差大臣林則徐一手在虎門燒煙土，另一手組織編譯三年前剛在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集為《四洲志》。林則徐被遣戍伊犁路經鎮江時，把《四洲志》未刊稿囑交入幕兩江總督裕謙的好友魏源；1843年魏源的五十卷《海國圖志》初刻本在揚州面世。另一本地理名著《瀛環志略》，是1842年道光皇帝召見福建布政史徐繼畲，向他打探各國虛實，並責成他纂書進呈的；兩年後，該書以《瀛環考略》問世。由此可見，在儒學經世致用思潮下，最早引起朝廷命官重視的是西方現代地理知識⑧。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納入國際條約體系。1861年清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4年該衙門編譯發行《萬國公法》。這本國際法譯著既是清廷官員解決外交糾紛的實用工具書，也是中文現代政治、法律用語的源頭。我們把該書的問世視為傳統天下觀向萬國觀演變的標誌⑨。在天下觀中，世界秩序具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而在世界地理中，中國只是萬國之一國，各民族國家的疆界必

須十分明晰。自1870年代起，中國在一系列邊疆危機中，不得不和西方各國簽訂邊境條約，世界地理知識成為清廷官員不可或缺的知識。隨着他們眼界的不斷開拓，「地理學」這個新詞彙出現了。

1891年出版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王錫祺憑一己之力、花十數年功夫搜集整理的中外地理著述匯編。從地理學科的建立上看，我們認為《叢鈔》有兩點特別值得重視。第一，《叢鈔》有關世界地理的記述中，攜帶着大量與西方現代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教育體制及其相關的五花八門的新知識、新觀念⑩；從其中八十四種清廷官員或士人出使、出遊外國的遊記、隨筆和聞見錄可以看到，由世界地理所引入的西學新知識是如何衝擊及改變中國士人的觀念。第二，《叢鈔》收錄了諸如《地球總論》、《地理述略》、《地理淺說》等與地理知識相關的理論著述，其中也有中國人傅雲龍撰述的《地橢圓說》，反映出中國人不但重視地理知識，也關注其理論基礎。

一般說來，某學科進入教育課程，代表着該學科的建立。1886年赫德 (Robert Hart) 輯，艾約瑟 (Joseph Edkins) 譯的「西學啟蒙」十六種，其中有兩種是地理教科書。此後，康有為在總結中國疆土被割讓、島嶼被佔領的教訓時曾指出，「推原其由，皆學校僅課舉業不講地理之故」⑪。甲午戰敗後，1895及1896兩年盛宣懷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先後在天津、上海創辦北洋西學堂和南洋公學，地理課成為必修課程。正是在南洋公學教地理課的張相文，1901年編著了中國人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初等地理教科書》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1908年又編出中國最早的自然地理學教科書《地

自1870年代起，中國在邊疆危機中不得不和西方各國簽訂邊境條約，世界地理知識成為清廷官員不可或缺的知識，「地理學」這個新詞彙出現了。外語也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時必須掌握的最直接的技能 and 知識，語言學也就成為最早起步的中國現代人文學科。



「西學啟蒙」十六種中的《地志啟蒙》

相對於地理學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這三門主要現代人文學科對應的中國傳統學問的現代轉型就困難得多了。這是因為它們與儒家經典和倫理規範結合得更為緊密，深受經世致用主導原則的約束。只有到儒學的基本價值開始受到質疑，才可能發生改變。

文學》；他也是中國第一個地理學會的創辦人^⑫。也就是說，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現代地理學就已基本確立起來了。

與地理學一樣，外語（及其語言學基礎）也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時必須掌握的最直接的技能 and 知識，語言學也就成為最早起步的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在中國傳統學問中，經學是核心，也可稱為大學；語言文字工具作為理解經典的必要學問而附庸於經學，被稱為小學。小學包括針對中文訓詁、字書、韻書等的專門技巧和精細內涵，是不同於西方現代語言學的知識系統，在清代發展到高峰。但是，傳統語言文字研究的目的是明經^⑬，這種語言研究與儒學不可分離的狀況，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期才開始改變。

1862年總理衙門建同文館，下設英文館，後加法文、俄文、德文、日文、格致館，負責培養通曉外語和西方技藝人才。1876年同文館所設課程有洋文（英、法、俄、德四國文字）、天文、輿圖、算學、化學和格致^⑭。

要學習西學各課目，就必須先掌握外國語言文字工具。1872到1875年間，清廷還先後派出平均年齡只有十二歲的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國留學。學習及掌握外語，必然要學習相關的語法知識，作為專門學科的「語言學」一詞也開始被中國人使用^⑮。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十五卷列舉十五門主要學科的圖書，其中第十二卷是「文字語言門」，這一門所選860種書目中「言語學」又單獨作為一類。這種分類方法不同於小學附於「經部」的傳統，顯示出語言學擺脫經學成為獨立學科的思維。

語法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問中的弱項。自元代盧以緯寫出《助語辭》第一部文言虛詞專著後^⑯，中文語法研究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明末至清代來華傳教士編寫出若干本中文語法書，使用了「拉體諾」（拉丁文）、「葛郎瑪」（語法）等語言學新詞^⑰，為中國語言研究注入新血液，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中國士人研究中文語法的著述。1898年，第一部中國學者編寫的以漢語為對象的語法書《馬氏文通》問世。作者馬建忠的家庭宗教背景及遊宦海外生涯，令他掌握多種西語；他又花費十幾年功夫深研語言學才寫成這本書。他之所以能編寫中文語法專著，是因為他認識到，第一，必須把中文視為人類所有語言中的一種，遵守普遍的語法規則；第二，須擺脫文以載道的束縛，做到事實與價值的分離，把語言作為客體來研究^⑱。因此，《馬氏文通》的出版被視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建立的標誌。

由以上分析可見，在清中葉以後興起的儒學經世致用思潮中，由於地理和語言文字兩門學問的工具性很強，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又處於附屬地

位，因此在與西學碰撞過程中最早、並逐漸擺脫儒學，中國的現代地理學和語言學得以在十九世紀末確立。

三 經學去中心化：歷史學和文學的脫胎與重構

相對於地理學和語言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這三門主要現代人文學科對應的中國傳統學問的現代轉型就困難得多了。這是因為它們與儒家經典和倫理規範結合得更為緊密，深受經世致用主導原則的約束。經世致用的重要原則可用1861年馮桂芬在〈采西學議〉所說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來概括^①，即學問不可與儒家倫理分離。只有到1895年甲午戰敗後，朝野都意識到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學的基本價值開始受到質疑，才可能發生改變。從此，中國進入張灝所說的轉型期^②，與文、史、哲相關的傳統學問才開始了現代轉型。

1898年張之洞的〈勸學篇〉可視為轉型的開端。該書的見解被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表面上看，它與馮桂芬的見解差不多，但深入分析表明，張之洞把「中學」稱為內學，用於「治身心」；「西學」是「外學」，用於「應世事」^③，這樣，中學和西學就被分為兩個可以並存的層面。這種二分法已經越出了經世思想，這就在傳統學問的核心打下了分崩離析的楔子^④。歷史學和文學與經學的分離從此開始。1900年庚子事變後，因為必須在公領域中全面引進現代學術、價值和制度，中西二分二元論成為指導清廷新政和廣大士紳的意識形態，中國進入傳統知識體系全面向現代轉型的新時期^⑤。

如果說「地理學」和「語言學」這兩個關鍵詞的使用，可以當作這兩門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標識，那麼，當時湧現的「新史學」、「中國文學」和「史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一系列新語彙，則可以視為歷史學和文學轉型的標識。如果可以用波瀾不驚來形容地理學和語言學的建立的話，那麼，現代文、史、哲的轉型則是由「革命」來開啟的。這是因為，它們實現現代轉化的前提是要與儒家倫理分離，即通過傳統經學去中心化，經歷與傳統母體斷裂的革命而獲得新生。這期間，「文學」這個關鍵詞也出現其詞意指涉範圍的狹義化和意義轉變，成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文學」。

二十世紀伊始，1902年梁啟超以〈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篇文章，拉開「史界革命」序幕。十九世紀文獻中「史學」是常用詞，梁啟超也清楚地知道：「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而他認為「新史學」與傳統「史學」根本不同，是經過革命而形成的新學問。換言之，梁啟超發起「史界革命」、「欲創新史學」，實際上是引入新規範和新標準來區別新舊史學，並斥中國無史。他使用的思想武器正是當時盛行於世的科學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梁啟超說：「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又說：「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所懷之哲理也」^⑥；他還強調，與「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相區別^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⑧。這三句話清楚地表明，梁啟超要把進步觀、價值與事實分立和揭示因果關係三項全新的科學標準

現代文、史、哲的轉型是由「革命」來開啟的。它們實現現代轉化的前提是要與儒家倫理分離，即通過傳統經學去中心化，經歷與傳統母體斷裂的革命而獲得新生。這期間，「文學」這個關鍵詞也出現其詞意指涉範圍的狹義化和意義轉變。

引入歷史研究。陳黻宸在〈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讀史總論〉中更清楚地說：「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②傳統史觀是以儒學道德倫理代表着宇宙秩序的天道為標準，持三代說和王朝易姓循環論，如用這三項科學標準來衡量，舊史學完全不符合進步史觀，因此被斥為「無史」。

在〈新史學〉中，梁啟超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也」^③；呼應他的鄧實則說：「中國史界革命之風潮不起，則中國永無史矣，無史則無國矣。」^④這種激進的說法，正是要把史學革命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聯繫起來。正如王汎森分析指出的那樣，梁啟超是借用了晚清引入的「國家」、「國民」、「群」以及「社會」等西方政治學概念，提出他的史學革命主張的^⑤。梁啟超指舊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⑥；又說：「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⑦。鄧實指舊史多「朝史耳，而非國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貴族史耳，而非社會史。統而言之，則一歷朝之專制政治史耳」^⑧。可見，梁和鄧都使用了現代政治學、社會學的概念和標準來打倒舊史學、建立新史學。

顧頡剛在總結他的研究歷程時曾說：「我輩生於今日，其任務則為結束經學。故至我輩之後，經學自變而為史學。」^⑨他用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改造舊史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把歷史研究從經學中解放出來。一旦群經解體，過去的文獻就變成史料，就需重新分辨真假，給出新解讀和新陳述。傅斯年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

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⑩周予同也指出：「使中國史學完全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的是胡適。」^⑪事實上，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倡導的「史界革命」，一呼百應。從1903年起，以新史觀編寫的多種中國歷史著述——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曾鯤化的《中國歷史》相繼問世^⑫。其中，1904至1906年，上述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夏曾佑編的教科書被嚴復稱為曠世之作。該書將中國史分為七個發展階段，可以視為中國歷史學科建立的重要標誌。

與歷史學差不多，文學的現代轉型亦需經過觀念的「革命」。在提出「史界革命」之前，1899年梁啟超在〈汗漫錄〉中提出了「文界革命」、「詩界革命」^⑬，1902年又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小說界革命」^⑭。梁啟超提倡詩、文、小說「三界革命」，尚沒有像「史界革命」那樣明確提倡學科的改造，但如同史學革命把古代文獻僅視為史料一樣，是要把詩、文、小說從經學知識系統中解放出來，只有把它們重新定位為文藝創作作品，才能建立以文學作品及其理論和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現代學科。

其實，作為現代學科的文學的確立，更能由「文學」這一古老關鍵詞的意義變化過程來來揭示。「文學」一詞經過了詞意變化和狹義化演變，才由其古典意義用法轉變為今天的現代學科專有名詞。「文學」作為“Literature”的譯名，是1881年日本《哲學字彙》釐定的，主要指不同文學體裁的創作及其理論和歷史的研究。這種用法與中文裏「文學」的古典意義很不一樣。林慶彰指出，早在《論語》中就使用了「文學」一詞，用於指「詩」、「書」、

梁啟超提倡詩、文、小說「三界革命」，是要把詩、文、小說從經學知識系統中解放出來，只有把它們重新定位為文藝創作作品，才能建立以文學作品及其理論和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現代學科。

「禮」、「樂」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學問^④；對應着包括儒學綱常禮教的經典、典章制度以及理解經典所需掌握的文字音韻、詞章、史地、詩學等相關學問。因此，「文學」是一個大口袋，類似於今天所稱的「文科」，只是裏面裝的學問不一樣而已。

十九世紀末在討論有關教育改制和課目設置的文獻中，「文學」是一個常用詞，常以「文學門」、「文學科」作為文科的大類，其名下包括多種中、外以文科為主的課目。例如，1897年，張元濟創辦專講泰西諸種實學的通藝學堂，在「文學門」下開設「輿地志、泰西近史、名學、計學、公法學、理學、政學」等九門西學課程。直到十九世紀結束時，如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說到「日本之強，固在文學哉」，仍是在傳統意義上使用「文學」一詞^⑤。但是，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⑥文句中的「中國文學」的用法，已不再是大文科概念，其內涵已大大狹義化。

林慶彰曾分析《詩經》、《尚書》、《禮記》、《左傳》、《論語》、《孟子》等文獻，如何從重聖人之道道德教化功能的儒家經典，轉變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對象，即視這些古代文獻是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他引用了胡適更為淺白的話說：「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十分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就不可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能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⑦

由此可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梁啟超提倡詩、文、小說「三界革命」，首先是把相關文獻重新定位，變為研究文藝創作作品及其理論和歷史的學科研究對象，這樣，作為現代學科的文學才可以確立。一旦「文學」擺脫了與儒家經典的聯繫，該詞的意義得以狹義化，才可以作為現代學科的專有名詞。

四 姍姍來遲的「中國哲學」

民國建立時，歷史學和文學大致已在第二階段擺脫經學的束縛而發展為新學科，只有作為義理之學的哲學研究，最後在第三階段才完成現代轉型。哲學義理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之本，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察建立哲學學科的困難所在。

第一，可以從為「哲學」定名的過程，來觀察義理之學納入哲學研究的漫長而艱難的歷史。西方哲學本是最早傳入中國的人文學科。早在明末，來華傳教士傳入“Philosophia”（拉丁文，意為哲學）時，就留下了「斐祿所費亞」、「理學」（艾儒略[Giulio Aleni]）、「性學」和「愛知學」（傅汎際[F. Furtado]、李之藻）；十九世紀又有「智學」（花之安[Ernst Faber]）、「格學」或「學」（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等名稱；在學科上，西方哲學包含的眾學科也簡稱為「理科」^⑧。這表明，一開始中國人是用儒學的理學來理解西方哲學的。最早將「哲學」與“Philosophy”對應的是日本學者西周，1881年《哲學字彙》把西周的用法確定為通用譯名。不久，「哲學」一詞傳入中國。最早使用「哲學」的中國人是顧厚焜，他奉命考察日本和南北美

當文學尚未實現現代轉型之時，經學和義理之學可以稱為「經學」或「道學」，放於「文學科」或「文學門」中；但是，二十世紀初當文學和歷史學開始現代轉型並發育為獨立學科時，就會發生很大困難了——是否將經學獨立出來、又將其置於甚麼位子。

只有在持續兩千年的王朝政治崩潰、民國建立，經學失去其功能之時，才有可能把儒學視為中國文化的道德哲學，整體地被納入現代學術規範，才能完整地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中國哲學作為現代人文學科核心地位的確立最晚，要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實現。

洲多國，回國後寫了多種出國考察報告，1888年出版的《日本新政考》使用了作為學科的「哲學」一詞^④。

雖然顧厚焜使用的「哲學」是指“Philosophy”，已與中國傳統理學分離了，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士人，包括王韜、康有為等談到涵蓋各學問義理及原則的大學問時，仍愛用「理學」一詞。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多次使用「哲學」一詞，僅書名中帶「哲學」的就有十六種^⑤；但哲學作為學科又被安排在該書第二卷「理學門」中，這一門包括十九類自然科學和幾門人文學科，即哲學、論理學（即邏輯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因為，在康有為心目中，經學高於哲學；他在該書按語中這樣說：「政治之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嘗考泰西所以強者，皆暗合吾經義者也」；又說：「凡六經，皆經濟學書也」^⑥。康有為對六經的讚美並不是為防範保守人士的策略用語，而是真心話。正如陳黻宸所說：「儒術者，乃哲學之極軌也。」^⑦。

第二，從如何為經學和義理之學在眾多人文學科中定位的角度來觀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教改課程設置中，如何擺放經學和哲學的位置常常是爭論焦點。當文學尚未實現現代轉型之時，經學和義理之學可以稱為「經學」或「道學」，放於「文學科」或「文學門」中；但是，二十世紀初當文學和歷史學開始現代轉型並發育為獨立學科時，就會發生很大困難了。困難在於，是否將經學獨立出來，又將其置於甚麼位子。相關爭論很激烈，一直持續到民初。

1903年張之洞主持制訂的《學務綱要》，取消並禁止設置哲學科，將

經學列為眾學科之首。其理由正如管學大臣張百熙所說：「蓋哲學主開發未來，或有驚廣志荒之弊」，「哲學置之不議者，實亦防士氣之浮囂，杜人心之偏宕」^⑧。而王國維於1903和1906年先後寫〈哲學辨惑〉和〈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兩文，旗幟鮮明地為哲學正名，反對大學取消哲學，並提出把哲學放入文學科目中的新方案來安置哲學^⑨。在為哲學正名中，蔡元培是另一員戰將。1903年，他在〈哲學解〉一文說：「哲學者，普通義解謂之原理之學，所以究明事物之原理原則者。」^⑩由王國維和蔡元培對「哲學」意義的理解來看，在中西二分二元的第二階段，漢語中「哲學」已與理學區別開來了。但是，一直要到1913年民國頒布《大學令》取消了作為主要學科門類的經學，哲學才真正成為獨立的現代人文學科。而191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⑪，則是中國學者按現代學術規範撰述的中國哲學史。

第三，哲學作為西方傳入的現代學科，是否應該或能夠包括儒家義理研究，亦是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上述第二階段中西二分二元論思維模式中，是無法處理經學的。因為，儒學義理承擔着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及社會秩序的合理性論證功能，經學是這一套政治和社會道德倫理的詮釋和註疏，它本身是一個完整而不能分割的主體。這樣，只有在持續兩千年的王朝政治崩潰、民國建立，經學失去其功能之時，才有可能把儒學視為中國文化的道德哲學，才可以整體地被納入現代學術規範，即這時它才能完整地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民國建立不久，發生了重新估計一切價值的反

傳統運動，否定儒家倫理超越現代理性的地位，用哲學範式來研究儒學才是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在諸人文學科中，中國哲學作為現代人文學科核心地位的確立最晚，要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實現。

顯而易見，一旦「哲學」不同於理學，則意味着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認識擺脫儒學的桎梏。關鍵詞統計分析可以佐證這一點，該過程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分析「哲學」一詞使用次數，可以發現兩個高峰，一個是1902年對西方哲學的介紹，另一個是1920年與新實在論、唯識論等有關的學界討論。第一個高峰意味着西方哲學不再屬於「理學」和「格學」。經第二個高峰以後，儒學的義理之學才被認為是哲學^⑤。中國哲學這一現代人文學科形成的過程表明：把西方哲學格義式地納入儒學窮理之學雖早，但意識到中國的「理學」應該是哲學的一部分卻步履維艱。新文化運動前，很少有把儒學視為哲學的言論；之後義理和中國古代思想才成為哲學研究對象。中國哲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得以確立。但是，即使到1926年，胡適的觀點尚未被人文研究者普遍接受。傅斯年在致顧頡剛的信中，明確表示「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⑥。

五 新文化運動、釐定新詞及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

縱觀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可以發現兩點。第一，其形成的先後取決於不同學科和儒學分離的難易；第二，儒學義理（作為人文

研究核心）成為中國哲學研究對象，是由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推動的。為甚麼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會有這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由現代學術本身的性質規定。現代性起源於西方，其實質是理性（ratio）和基督教信仰的二元分裂，即理性和現代價值從宗教信仰中獨立出來。其表現是自然法的分裂以及自然律成為理性研究對象。與自然律從自然法分離同步發生的是現代價值的核心理念——人權觀念的形成。這樣，現代性在認知領域的表現，就是這些本屬於基督教神學的知識領域從經院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現代工具理性認知的對象並納入現代價值系統。最早從經院哲學中分離出來的是自然哲學，它是現代科學的母體。

如果說對自然律之理性研究導致現代科學誕生，那麼對現代價值系統及它和社會與國家關係之探討則催生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西方的出現亦是該研究領域從傳統中分離出來（如果該學問在傳統學術中亦存在的話），經濟學從亞里士多德的家計學中脫胎而來就是典型例子^⑦。現代歷史學和文學的形成比經濟學和社會學要晚，這兩個現代學科的建立，往往依賴於並伴隨着各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立。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現代史學觀和德國文學在狂飆運動中形成，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前提是學習西方現代價值系統。因人文研究內容原來就是存在於傳統文化（儒學）的內容，故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順序取決於學習過程中相應領域知識系統與儒學分離的難易程度。儒學本是一

縱觀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的內在邏輯，可以發現兩點。第一，其形成的先後取決於不同學科和儒學分離的難易；第二，儒學義理（作為人文研究核心）成為中國哲學研究對象，是由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推動的。

個包羅萬有的大口袋，幾乎可以將所有傳統學問都包容進去。曾國藩曾將學術分為四類：「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曰經濟。」⁶⁰其中義理是儒學的核心，考據和詞章亦是中堅部分；「經濟」作為經世濟民之學是儒學的應用，那些與強化事功能力有關的形形色色實用知識則處於儒學的邊緣。故當西方衝擊來臨時，其邊緣部分最容易與儒學分離，最早被學習而來的現代價值系統所支配。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全面學習現代價值的前提是理性和終極關懷的二元分裂。它表現在思想上，就是中西二分二元論的確立，即公理和儒家倫理的分離。由此可以理解，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確立雖然比西方晚，但也是伴隨著傳統帝制解體、民國建立，到民國初年才完成。這與現代性在西方起源是同構的。

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的不同在於，其終極關懷是道德哲學而非神學信仰。道德哲學也必須納入現代理性研究的範圍，但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中，儒學義理並不在公理籠罩之下，所以它還不是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要將其納入工具理性和現代價值系統的考察對象，有賴全盤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到來，即上述第二個特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儒家倫理再也不是新知識份子的終極關懷，儒學的核心價值成為工具理性考察的對象，義理之學作為哲學一部分的條件才最後成熟了。由此可以理解，為何現代人文學科形成於民國初年，而其最核心部分——中國哲學成為現代學科，一直要到經歷了新文化運動才最後完成定型。

從文、史、哲等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過程來看，它們是中國現代觀念形成和轉化的一部分，折射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特點和本質，構成了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獨特角色。

最後，我們回到本文開始提到的1913年馬相伯「函夏考文苑」的提議。馬相伯指出，成立國家級的最高研究機構，必須立即着手做兩件事情：第一是「作新舊學」，第二是「釐正新詞」。所謂「作新舊學」是用現代觀念對中國傳統舊學進行改造，使其系統化成為新學；這正是本文從觀念轉變來分析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的研究背景。當時，又是甚麼原因令馬相伯認為與「作新舊學」同等重要的當務之急是「釐定新詞」呢？據語言學家研究，「如果一篇文章中未知詞語超過百分之十，讀者將無法準確理解文章的意義」，而從清末到五四前新詞的數量已佔到漢語3,000常用詞的百分之三十以上⁶¹；造成溝通的極大困難。馬相伯正是針對在第二階段中大量新詞在使用中引起的混亂，而提出「釐正新詞」的主張。

表面上，馬相伯是針對二十世紀前十年漢語新詞爆炸引起溝通交流困難而言，其實，語言用詞的混亂背後是思想的混亂。而新文化運動正是一個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結束混亂的時代。這一思想運動也包括了語言更新的白話文運動，結束了文言文獨霸書面語言，在現代漢語定型過程中，逐步釐定、規範了現代術語。從1913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十五年間中國의思想和語言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洗刷和再造。從此，人文學科才真正走出要不要現代轉型的困擾，進入發展的新時期。

從文、史、哲等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建立過程來看，它們是中國現代觀念形成和轉化的一部分，折射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特點和本質，構成了人文學術研究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獨特角色。

註釋

① 左玉河提出『四部之學』(經、史、子、集)向『七科之學』(文、理、法、商、醫、農、工)轉變，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形態轉變的重要標誌」。參見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2004)，導論，頁2。

② 馬相伯：〈函夏考文苑議〉，載方豪編：《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頁8-15。「函夏」一詞出於《漢書》「以函夏大漢兮」，意為「中國民族」；「考文苑」、「阿伽代米」、「學士院」、「學院」都是“academy”的譯名。

③ 近十餘年來，從不同面向來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建立的著作相繼問世，以下是與文科相關的部分著述。從學科分類及體制建立的，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從思想史演變脈絡的，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以人物為中心的，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從中西文化相互激盪的，王先明：《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從某一學科入手的，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台北：麥田出版，2002)；張越：《新舊中西之間——五四時期的中國史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侯雲灝：《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與變革》(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王建軍編著：《中西方語言

學史之比較》，修訂本(合肥：黃山書社，2009)。

④ 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Robin G. Collingwood)認為歷史被壓縮(incapsulated)在人類今日的思想中。而任何思想都需藉由反映該時代觀念思想的詞語來表達，因此，德國歷史學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把用特定術語即詞彙表達的觀念稱為「概念」(concept)，主張從概念意義的分析和被使用的語境去挖掘思想變遷的真實過程。

⑤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繁體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簡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⑥ 例如，1875年林樂知在《中西關係略論·論謀富之法》中列舉了許多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和應用工程的學科之後提到了「地理學」。林樂知：《中西關係略論·論謀富之法》，收入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182。

⑦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十二章，「王朝地理之學」，頁295-96。

⑧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不但提出了作為經世思潮的典型語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還對「何為中國」提出了新解：「印度據南洋、小西洋之間，釋氏皆以印度為中國」；「天主教則以如德亞為中國」，「而回教以天方國為中國」。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四，頁1。轉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374。可見，對世界地理知識的掌握也必然會衝擊中國中心觀。

⑨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4月號，頁40-53。

⑩ 參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第四章，「地理學研究與民主、科學思想的傳播」，頁198-238。

⑪⑫ 轉引自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

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58；260。

⑫ 參見吳傳鈞主編：《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地理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頁273、308。

⑬ 戴震很確切地指出文字學問是通經明道的工具，他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183。

⑭ 高時良、黃仁賢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頁92-99。

⑮ 1879年王之春的《東洋瑣記》中有「復有傳各國語言學及女師範分門別戶均以四年為定額」一句，使用了「語言學」一詞。王之春：《東洋瑣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著易堂，光緒二十三年〔1897〕；杭州：杭州古籍書店影印本，1985)，頁341。

⑯ 王建軍編著：《中西方語言學史之比較》(合肥：黃山書社，2003)，頁162-63。

⑰ 李真：〈跨越漢語的長城——以早期入華傳教士語言學習為中心〉(2010年4月25日)，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網頁，www.sinologystudy.com/2010/0425/13.html。該文介紹了高母羨的《漢語文法》(1592)、衛匡國的《中國文法》(1653)、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1703)和馬若瑟的代表作《漢語札記》(1728)等傳教士編撰的一批漢語文法著作。

⑱ 許國璋在《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一文概括出他的研究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世界一切人種「天皆賦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文所以能達此理」；二、凡語言都有「其字別種而句司字」這個「一定不易之律」；三、中國人「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無暇去學習應學的知識，是自取愚昧；四、西文的規矩(語法規則)和華文的義例(文法)是一致的。參見《中國語文》，1991年第3期，頁161-66。我們從這四點又概括出以上兩個要點。

⑲ 馮桂芬：〈采西學議〉，載《校邠

廬抗議》，卷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151-52。

⑳ 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二十一世紀》，1993年8月號，頁11-18；〈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頁29-39。

㉑ 張之洞：〈勸學篇二〉，載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9767。

㉒ 張之洞將「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稱為「中學經濟」，而「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統稱為「西學經濟」。參見張之洞：〈勸學篇二〉，頁9750。西學經濟因和儒家倫理無直接關係，這時，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律研究開始在中國確立。

㉓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50-55。

㉔ 以上引文均出於梁啟超：〈新史學〉，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7。

㉕㉖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

㉗ 《陳黻宸集》，下冊，頁676。轉引自張越：《新舊中西之間》，頁42-43。

㉘㉙㉚ 梁啟超：〈新史學〉，頁7；3；1；6。

㉛㉜ 鄧實《史學通論》中的文字，轉引自張越：《新舊中西之間》，頁8；7。

㉝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195-220。

㉞㉟ 轉引自張越：《新舊中西之間》，頁125；126。

㊱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史料論略及其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40。

㊲ 張越：《新舊中西之間》，頁53。

㊳ 如「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

迨將絕」、「中國若有文界革命」。參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附錄二，〈夏威夷遊記(舊題汗漫錄又名半九十錄)〉，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五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91；或載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219、1220。

③⑨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載《飲冰室文集全編》，卷九，學術二(上海：新民書局，1930)，頁22；或載下河邊半五郎編：《飲冰室文集類編》，上冊，通論(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1904)，頁386。

④⑩ 林慶彰：〈經學與文學的關涉〉，載林明德策劃：《中國文學新詮釋：關涉與意涵》(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27。

④⑪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頁264。

④⑫ 參見林慶彰：〈經學與文學的關涉〉全文，頁23-49；該文頁31-32引用的胡適：〈談談詩經〉，載藝林社編：《文學論集》(北京：藝術林社，1959)，頁1-20。

④⑬ 參見陳啟偉：〈「哲學」譯名考〉，《世界哲學》，2001年第3期，頁60-68。該文考「哲學」譯名甚詳；明末清初文獻中「理科」用法：「極西諸邦課士之典分為六科，理科其一，斐祿所費亞是也。」頁62。

④⑭ 顧厚焜：《日本新政考》，卷二中談到日本教育的課程設置「三國文漢文，四英語，五地理歷史，六理財，七哲學」。顧厚焜：《日本新政考》(1888)，收入梁啟超輯：《西政叢書》(上海：慎記書莊，光緒二十三年[1897])。黃遵憲寫於1887年的《日本國志·學術志一》，也用了「哲學」，被不少學者認為是中國人最早使用「哲學」的，但該書到1895年才出版。

④⑮ 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載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00-29。該文列舉出《色情哲學》、《麻氏經濟哲學》、《歷史哲學》、《言語哲學》、《教育哲學史》、《宗教哲學》和《基督教及哲學》等書名。

④⑯ 《陳黻宸集》，上冊，頁415-16。

轉引自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頁260。

④⑰ 〈張百熙議奏興辦學堂摺〉(1903)，載《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66。轉引自陳啟偉：〈「哲學」譯名考〉，頁68。

④⑱ 王國維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中說：「由余之意，則可合經學科大學與文學大學中，而定文學科大學之各科為五：一、經學科，二、理學科，三、史學科，四、國文學科，五、外國文學科。」轉引自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頁195。

④⑲ 蔡元培：〈哲學解〉，載明夷等輯：《新學大叢書》(上海：積山齋記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轉引自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頁316。

④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網站的胡適著作分類中，該書列為胡適的第一本中文著作。參見<http://140.109.152.48/koteki/MainFrame.htm>。

㉑ 根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統計所得。過去十多年，筆者開始了利用數據庫方法、以關鍵詞為中心的中國近現代觀念起源和演變的研究，並建立上述包含從晚清到新文化運動約一億二千萬字文獻的數據庫。

㉒ 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載《史學方法導論：傅斯年史學文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87。

㉓ 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劉鋒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載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62。

㉔ 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載唐浩明編：《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442。

㉕ 轉引自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頁19所引用的曹煒的研究。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創刊編輯

金觀濤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